

社会融合¹

罗伯特·安吉尔 (Robert Cooley Angell)

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配合而构成一个整体，一直是一个具有实际应用及学术的价值的问题。从历史上而言，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普遍分裂的事实导致人们关注维持社会融合或取得再融合这些现实问题。社会和团体都力图避免分裂，一旦发生了分裂，则尽力重新取得有效的统一。按照科学的方法，这存在着定义和理论上的挑战。社会融合是一元的，还是一个包含多元因素的现象呢？什么是可以判断社会融合存在或者缺乏的有效标准？除此以外，没有更基本的问题了，因为要彻底对待社会成分就是能够从非社会成分中区分出这些成分来，这需要关于融合的一些概念。一旦概念化的问题解决了，就有了更深层的理论问题，即融合程度高低的原因及这些问题对其它社会现象的多方面影响。

社会融合在各个层次上都是有疑问的，从小群体到整个社会。虽然就分析而言，各个层次可以被区别对待；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一个群体通常是一个涉及两个层次的主体。在低层次上，它是一个整体，其各部分有待融合；但是在相邻的较高层次上，它则作为一个部分，或多或少地被融合进某个更大的整体之中。比如，社群有其本身内的融合问题，但是它们构成了其所在社会融合问题中的基本元素。本文仅仅针对较大的社会系统，如城市、整个社会和国际社会；关于较小的社会系统的融合将在其它地方进行讨论（参见“凝聚力”、“社会”词条）。

社会融合的类型。近年来，社会学界倾向于认为融合具有多种不同类型而不是给出一元化的概念。正如 Landecker 在其开创性的文章（1951 年）中所指出的，确定一个现象不同因素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其统一的程度，这在研究的早期阶段是有用的。他区分了以下四种融合的类型：文化融合，或者文化标准之间的一致性；规范化融合，或者文化标准与人类行为之间的一致性；传播性融合，或者传播网渗透到社会系统的广度；功能性融合，或者劳动分工系统的各个单元之间相互依赖程度。在此，后三种融合的类型将被认为是包含在社会融合中。因为在 1951 年之前，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的区别不是很大 (Parsons & Shils, 1951; Parsons, 1951)，所以那时将社会文化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对其融合所进行的分析也将被重新讨论。

迪尔凯姆 (Durkheim) 的贡献。研究社会融合的伟大开拓者是 Durkheim (1893)。相对于社会思想史上很早期的两种观点，他提出了两种相反的类型。第一种是文化融合和规范化融合的结合体，第二种是功能性融合。

他所说的“机械化结合”是指各个部分通过普遍意识和信仰而融合。这些意识和信仰组成了公共道德，使得人们和群体能够成功地合作。为了安置这一道德，Durkheim 没有清晰的证据就想当然地认为，文化标准和它们在人们心中有效地内化是完全一致的。因为社会成员以相同的方式表现出公共道德，正如固体的分子表现了其基本的特性，他认为“机械化结合”这个术语是恰当的。

与机械化结合相对，Durkheim 区别出“有机结合”，即通过相互依赖而融合。社会各部分之间互通有无就如同生物体各个部分所作的。Durkheim 认为自己论文的最主要贡献在于证明劳动分工不仅仅如一般人所认为的是一种经济因素，同时也是一种道德因素。责任从专家们的必要合作

¹ 本文译自 1968 年出版的《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中的“Social Integration”词条 (*Integration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 & The Free Press, pp.380—386)。



中引发出来，这不单单是契约中指定的责任，而是对于行为的意义、性质等的合理期待。

虽然 Durkheim 的兴趣在于社会系统的融合，但是他使用了文化系统中的两个要素——强制性规则的总量和还原性规则的总量——作为这两种融合类型的相对重要性的指数。他的理论是，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在（社会）系统中具有相似的行为；那么该系统拥有强制性的规则；在某种程度上，（社会）系统是一个差异互补的系统，则具有还原性规则。他推断随着文明的发展，有机结合逐步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还原性规则在增强，而强制性规则在降低。

索罗金(Sorokin)的方法。对社会文化系统中两种类型作出截然不同的区分的是 Sorokin(1937—1941)。虽然他强调的重点主要是在文化融合上，但是其中一种类型——“因果功能型”——这关系到正在运行的社会系统中，文化因素之间有效地相互依赖；这样，根据 Landecker 对术语的定义，它包括了文化的和功能性的融合。因果功能型的融合回溯到 Sumner 提出的社会习俗中“习惯性张力”(1906, P5)。Sorokin 没有对这个类型进行深入地分析，因为他认为它相对于第二种融合类型是次要的，即“the logico—meaningful”。此后社会学的分析家倾向于认为功能性融合发生在个人、群体或者制度上，而不是发生在文化因素中。Sorokin 的 logico—meaningful 性融合则是纯文化性的。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它指出文化因素反映核心主题和主要原则。Sorokin 从历史的角度广泛地考察这一融合类型，使其成为是众多文化融合研究者的成就之一。

此后的理论方法

在 Sorokin 的著作之后，规范化融合和功能性融合从文化融合中的分离愈加明显，传播性融合开始得到关注。关于这三者的分析相次出现。

规范化的融合。Parson 著作(1937; 1951; 1960)的主要意图是对标准化融合的分析。根据他的理论，当文化系统中主要因素——社会的普遍价值——在社会系统的结构性因素作用下被制度化，这一融合就达到了。这一融合在三个层次上发生。在应用中最为普遍的规则是应用于划分人们类别的规则，例如男人和女人。相对普遍的是对群体的规范化管理，例如企业和学校。最后，在群体中有被结构化的角色，例如母亲、父亲、教师、学生。这三者各自存在着约束，正如正当行为的规范。

然而，证据可以证明较大系统的规范化融合并不能完全得到其下属次级系统之规范化融合的支持。Shils 和 Janowitz 在对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国防军的研究(1948)中有一项发现，忠实于国家军规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基层团队的社会凝聚力。Grodsocial (1956, P.29) 发现证据证明小群体对于英国人的爱国精神相同的影响。这种团体的意义和本文所讨论的任何一种类型融合都是不同的，因为它依赖于人与人之间关系(参看 Cohesion, social)。

因为对规范化融合所作的研究不多，几乎还没有什么理论将它和社会系统的其它方面联系起来。出于对社会生存的担忧，人类智慧长期认为来自外部的敌对力量可以提高社会规范的凝聚。这个假设看起来很正确，然而这是基于融合已经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之上；假如社会的各个部分没有强烈地融入整体意识中，外部的敌对力量可以摧毁这个团体而不是强化它。至于内部因素，因为复杂的社会中较大的困难是社会规范完全的内在化，所以绝大多数学者认为规范化融合的变化倾向于和社会规模成反比。由于缺乏衡量的手段，无法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此外，虽然广泛的意见确信领导阶层制造了差别，但是没有数据显示它与规范化融合之间的关系，除了一些对极小团体的研究。



对于其它现象中规范化融合不同程度的研究理论也同样很少。很多人认为融合程度高是一件好事：它提高了社会的稳定性，对生活有意义，确保了社会的生存。而其他则对此表示怀疑，指出对现有规则的背离有时候是创造性的，过于固守一种道德秩序会导致缺乏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例如，Ryan 和 Sraus (1954) 声称，僧加罗社会缺乏制度，较多地容忍道德上的背离，这并没有阻碍它的社会融合。

功能性的融合。从 Durkheim 的时代开始，功能性融合的概念的发展就和人类学、社会学关于功能主义的讨论混杂在一起。正如一些人类学家所做的，假如在进化过程中幸存下来的社会的特殊成分对社会系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那么功能性融合是毫无疑问的，社会选择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每一个部分都对同一个整体的繁荣做出贡献，那么这些部分之间也彼此做出贡献。然而，大多数的社会学家并不采取这样的立场。例如，Merton (1949) 认为，每一个部分对于整体可能都保持着功能性结果的完全平衡；但是为纯粹积极的平衡所掩盖的功能紊乱的结果，对特殊成分之间的关系完全无益。因此一个化工厂通过它所付出的工资给社会带来繁荣，可能严重污染空气以至于危害附近医院病人的健康。在这样的例子中，功能性融合是微弱的。

甚至对功能性结果的完全平衡的假设也并不是必要的。根据极端唯名论者对社会的观点，各个部分可以或者不可以成为其它部分的补充；并没有真正的有机整体，因此功能性融合并不是根本的。对于功能性融合之普遍性，也同样有很多怀疑，这得到了像 Dahrendorf (1957) 这样的冲突论者的证明，对于他们而言，功能型融合必须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证明其在每一个实例中的存在。无论这样的证据是否是本质性的，没有明确的评判标准，以功能性融合的概念来进行经验主义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正如 Landecker(1951: 338)所指出的，至少具有两种标准：特殊性的程度和相互依赖的程度。关于这两种评判标准的研究都很缺乏。

多数学者认为社会融合保持了等价的平衡，如果不是静态的，那么就是运动中的。Gouldner (1959) 对这一观点，至少在功能性融合方面提出了置疑。他说，各部分都具有某些功能自主性的倾向，所以整个系统趋向融合则造成了一种紧张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各部分之间的平衡和融合一样都要求彼此隔离；如果各部分之间没有充分的隔离机制，不断加强的融合可能引起各部分之间的冲突从而导致失衡。Gouldner (1960) 对相应的关系提出了更基本的观点，认为功能性融合预示着任何两个部分对于彼此的贡献经常是很不平等的，因为权力较大，其中一个可能剥削另一个。然而，他认为这种局面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他相信互利原则是发展的和必需的，就像公平交易一样。依据 Gouldner 的论述，可以得出，功能性融合需要对坚持互利原则，所以它即便不是依赖于标准化融合，也是与它密切相关。

Parsons 通过不同的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果 (1960)。在一篇关于 Durkheim 的文章中，他同意关于机械结合和有机结合的区分，因此有效地推出标准化融合与功能性融合之间的区分，但是他说这二者在更高的水平上以一种 Durkheim 并不认同的方式联系起来。Parsons 建议将机械结合看作普遍价值的表现，这些价值通过政府得以整合。而另一方面，有机结合则来自于其经济制度，它的所有权、契约、市场等等关系的准则。这样，有机结合完全依赖于普遍价值，就和机械结合无甚差别了。在此，Parsons 似乎将功能性融合置于规范化融合之下，他断言如果没有规则来控制其过程，相互依赖不可能达到一体化。但是他并没有将有机结合从属于机械结合，因为二者在制度化过程中是处于同一水平。他创造了“扩散性结合”这个术语来表示对普遍价值的附加，代表涵盖二者的更高级的类别。实现扩散性结合的社会结构是什么样的，这在 Parsons 的论述中并没有明确的阐述。



Parsons 对 Durkheim 观点的改造与 Durkheim 本人后期的著述（1912）更相符，在这些著述中，所有的迹象都表明，他不再认为机械结合的衰弱和有机结合的上升成比例地进行。实际上，在《社会劳动分工》的第二版序言里，当 Durkheim 试图说明有机结合如何通过职业群体一定得以发展，他很难支持自己的观点。

虽然对功能性的分析有丰富的著作，但是几乎没有关于功能性融合概念的著作，对于它和其它变量的关系的研究则更少了。人类生态学家对引起高度功能性融合的原因及其影响的普遍方式感兴趣，但是他们没有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测量方法使得研究可以进行下去。大多数被认为有利于功能性融合的变量不是被动的条件，而是相当合理的、有目的性的行为，例如应用对人力管理的研究和区域规划。

关于功能性融合的影响的理论很少。有一个理论是功能性融合的增加将提高现率、减少浪费，这个理论几乎是多余的，因为其定义已经暗示了这个结果。除了它在经济上的重要意义，极少或说没有关于功能性融合影响的理论。

传播性融合

对传播性融合感兴趣的有社会学家 Wirth 和 Shils、政治学家 Deutsch。Wirth 说明了在现代民主政治之下，大众传媒在获取舆论上的重要性。然而，他将通讯手段看作仅仅是舆论的一个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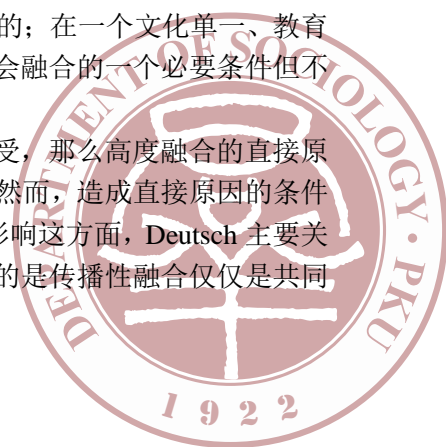
舆论不仅仅由相互依赖和普遍的文化基础、一套包含整合了的传统制度及其暗示并施加影响的规范和标准来维持，不仅仅由共同生活和彼此交往来支持；同时，至少有些重要的是，通过大规模传播的持续流行，就其意义和影响而言，它们依据社会某些形式的先期存在依次进行，并保持那个社会协调并推动其持续一致的行动（Wirth, 1948: 10）。

Shils 的观点更深入，讨论通过大众媒体，现代科学的中心和外围较已往更彼此接近。他相信对责任的同感形成了他称之为“文明”，表现出舆论达到的新层次：“大众社会并不是现存社会中最和平的、最有秩序的社会，但它使最具有认同感的”（1962: 53）。对于 Shils 而言，外围和中心的连接主要在于大众对于社会的核心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依赖。这样，传播因素被视为和规范化融合紧密联系在一起。

Deutsch（1953）比其他社会科学家更始终如一地使用由电子工程师和心理学家倡导的传播模式（参看《信息理论》）。虽然他并不是很清晰地使用“传播性融合”这个术语，但是他对民族主义这个概念的处理对它进行了暗示。根据 Deutsch 的观点，一个国家的人民促成社会的形成，依赖于他们同化的程度（在交流中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的正确性）和流动的程度（通过大众传媒能够实现民族参与）。这些概念除了应用于国家，可以应用在团体上。

Deutsch 的分析是具有说服力的，因为假如它能够被接受，传播模式可以用于将差别很大的规范化融合和功能性融合的概念联合起来。然而，困难在于很多证据表明单是传播不足以达到社会融合。在同一个传播网中很好的理解彼此的各个部分并不总是合作的；在一个文化单一、教育程度高的国家中，政治争斗则很少发生。这说明传播性融合可能是社会融合的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如果 Deutsch 对同化和流动的概念作为对传播性融合的定义被接受，那么高度融合的直接原因是相当清楚的——用于大众传媒的一套普遍而丰富的符号和途径。然而，造成直接原因的条件没有被充分地研究，虽然 Deutsch 提出了许多假设。在传播性融合的影响这方面，Deutsch 主要关注政策制定过程的更大效力，使得高度融合成为可能。但是必须强调的是传播性融合仅仅是共同



行为的一种能力，而不是现实存在的事件。

次生型态之间的联系。在已涉及的三种类型融合的原因及影响之外，存在一个问题，即是这三种融合与文化融合如何相互影响。Landecker (1952) 引出了这个重要的研究问题并且给出了一些假设。其中之一是低传播性融合与低标准化融合相关，至少在现代城市中如此。众所周知的，社会混乱和犯罪联系在一起，说明社会混乱是低传播性融合的一个征兆。但是最后这个联系需要通过研究来证明。

所有应该包含在社会融合中的现象，无论能否被指定为这个或那个类型，问题都能够被提出来。什么是现代社会的立法和司法机构？它们的活动难道不是解决冲突促成融合的吗？从范围上来说，司法仅仅应用现存的法律，它们有助于确保行为合乎文化规则。但是立法机构正在创造新的法律条文，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司法也扮演了一个创造性的角色。这项功能在 Landecker 所定义的任何一种类型之下，都没有变得清晰。它似乎与标准化融合而非与其它类型联系更密切，因为新的标准正被创造出来，和社会的终极价值一同成为指导方针 (Angell, 1958)。在这里，在传播的网络中（正如当废除种族歧视打破了传播的障碍的时候）和系统功能性融合中（如当新的平衡机制被创造出来的时候）都可能存在正在解决的类似的问题。也许把这些现象合并到一个融合模式中的最好方法，是得出每一种融合的动态趋势，用系统的方法来应付不断变化的环境。

对社会融合的经验主义研究

关于对社会融合的口头定义和其概念的改进的想法的数量，和用于测试假设的经验主义研究的数据是不成比例的。这也许是因为潜在的研究者将大的社会系统的融合视为全球性现象以至于无法顺利地研究；但是一个更可能的原因是研究的首要类型——对既定概念最好操作的定义——很少被接受。像功能性融合这样的概念应如何被操作，这根本是不明显的。最有效的定义不能被选择，概念也不能标准化，直到各种可操作的定义在它们直观的一致性基础上被比较。仅仅存在两项关于社会融合有志的经验主义研究，二者都力图对付这个问题以作为对测试假设的初步准备。

安吉尔 (Angell) (1951) 站在标准化的观点上研究美国城市的融合；他的目的是比较 42 个城市标准化融合的程度，发现其差异的原因。融合的一个标准来自于将犯罪率的指数（颠倒的）和公民对社会所作贡献的积极的指数（使用社会基金图表）结合起来。通过使用大量其它的标准化的指标，例如自杀，非婚生子，性病引起的死亡来测试协方差，这个标准是有效的。每个城市的融合值与其它的数据相联系。如果彼此之间无任何联系，则发现两个因素在结合之中，其标准化融合产生了一 79 的系数。这些因素是将人口根据种族血统、国家背景和人口迁入迁出的比率分为不同成分。后来在四个城市中进行的样本调查肯定了结果，指出标准化融合的另三个很可能的重要性因素——社会统治结构，在学校中对社会强调的总量，以及在教堂中相同强调的总量。

Deutsch 和他的助手们对融合的卓越的研究 (1957) 集中在传播性融合，虽然它蕴含了标准化融合和功能性融合的意义。在这项研究中，Deutsch 对于融合的基本方法应用到国际的层次上，这个方法曾被发展到国内研究的层次上 (1953)。这样，他集中寻求国家之间高度融合的原因，这把它们带入到一个称为“安全社区 community”中，在这其中大规模武力变得不可思议。关于在北大西洋地区形成安全社区 community 的 10 个例子的历史事实被细致地分析。

Deutsch 等将融合定义为“……在领土范围内，获得一种‘社会感’，在一个长时段里，在



其人口中，制度和习惯足够有力并广泛传播，得以确保对‘和平转变’的期待”（1957：5）。根据这些指标，例如同感和忠诚，研究本身充实了概念的架构；我们感觉到信任和彼此关心；按照自我形象和兴趣的偏好认同；共有的对行为的成功预测。所有这些概念使人联想起小群体的融合指标，而且明确地来自于基于传播理论上的观点。

虽然 Deutsch 没有建立关于动因的明确的假设，但是他的发现建议关注传播性融合方面的数据。动因一方面聚合到原先的状态中，一方面聚合到融合运动的特性中。融合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都被着重强调。第一个是与政策制定相关的主导价值相符的。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重要的价值都是相似的；那些有差异的例如宗教价值，可能通过非政治化来达到协调。无论如何，标准化融合与传播性融合存在相同的成分。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政府的才能，这涉及到迅速、充分、非暴力手段地对他人的需求、信息和行为做出反应（这儿暗示了功能性融合，因为需求被说成是有差别的。）这一才能依赖于习惯和制度的存在，这些习惯和制度确保信息被理解，并在决策过程中得以受重视。这儿的推理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循环，因为融合本身将创造这样的习惯和制度。最后，在讨论政治融合运作的动力时，作者强调了智能及其它们所搭建的桥梁的重要性，人口迁移率的重要性和生命参与感的重要性。

未来前景。

你一定得出这样的结论：关于社会融合概念化、可操作性、研究理论表述都不能令人满意。虽然这个概念已经被析分为三种类型——标准化的，功能性和传播性——这三者被区别对待，但是这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学者之间缺乏一致意见。

在三种类型当中，对标准化融合的概念的定义是最完善的，这要感谢 Parsons 的研究，但是即便如此，该定义还是有不清晰的地方。功能性融合的概念是基础性的，因为没有人确定它所代表的是现实的哪一个部分；劳动分工是一种融合现象，这仅仅是一个信仰而已。对于传播性融合，其概念的含义非常明确——通过有用的渠道，可理解的信息在其中立冬，系统各个部分相互连接——但是问题仍然存在，这是否不是融合的一个方式（rather than a kind of）。这些定义不确切的类型之间的联系本身是不明确的，这是值得惊讶的。唯一的假设（move toward an ordering）是 Parsons 关于扩散的团结等价于社会融合的建议（因为它包含了机械的和有机的团结，也有可能包含了传播性融合在内。）

也许在对融合研究中，最关键的弱点在于大多数的学者未能清楚地表达他们的标准，以及详细说明判断其实现程度的过程。关于各种融合原因和影响的假设在其为完成以前都不能被测试。因此极少数的研究可以构建出理论。

那么，社会融合在许多人的头脑中保留了一个核心的概念，但是它只是一个远没有得出结果的概念。时间会判断二者中的哪一个将成为这个概念的定义。要么它遭到废弃，因为社会科学家发现这个观点对于一个科学概念而言太过宽泛，要么它将激励热爱科学的人去形成它，使其对合理的理论发展有益。

（张玲 译）

【译文选载】

